

人贩子该判死刑吗?

石述思

这是一个在网络圈很有号召力的呼吁:“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 拐卖儿童判死刑! 买孩子的判无期!”

按照以往的惯例,伴随着“是中国人就转”、“是妈妈就转”的情绪高八度声浪,这个颇有煽动性的呼吁得到了广泛认同。

说心里话,当下社会最匮乏的是理性思维和契约精神,而不是随时被点燃的欢呼和怒火。对于任何一个成因复杂的社会问题,最危险的结合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情怀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尖刻。

法治的公平根本建立在基于人道的零度情感。于是,这一轮激情无比的呼吁遭到了一批法学家、社会学家的反对。

但很遗憾,一些专家的反对却同样充满着令人遗憾的偏颇,严重偏离了理性和人道的轨道。

最典型的反对声音是:死刑对犯罪的震慑力非常有限,故意杀人的首选是死刑,可现实是故意杀人的犯罪无法禁止;其次,如果判人贩一律

死刑,那人贩子就会成为活在刀尖的亡命之徒,中国人都知道,亡命之徒可怕且不好抓,把人贩一律判死刑,更可能的是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也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难。

显然,这决不能构成不对人贩子处以极刑的理由,甚至是经不起驳斥的。死刑作为现行最高刑罚,对遏制犯罪的积极作用不能一味扼杀。在一个有着悠久“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观的国家,如果取消死刑,无异于对一些丧尽天良、人性灭绝歹徒的变相纵容。正如恶性犯罪无法彻底消灭,严厉惩罚不可松懈,无论是故意杀人还是拐卖人口恶性案件。

西方社会这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大力倡导对重大刑事罪犯慎用死刑,乃至取消死刑,并逐步被中国法学界广泛认同,核心理念是基于人道为核心的现代伦理,但别忘了,在有着悠久基督文明等宗教传统的西方,对人最大的惩罚却宛如一句格言所言:不自由,毋宁死。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社会,容易形成一个全民共识:终生监禁比处死更残酷、犀利。

另外,从人道的角度考量,仅仅对人贩子处以极刑产生对生命的怜悯也是严重值得商榷的。

人贩子多数并不剥夺被拐者的性命,却要最终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岂不显失公平?非也。在现代社会,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被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在摆脱温饱的中国,人的价值不能仅仅靠是否拥有面包衡量,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有尊严地活着。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打拐互动,也与很多被拐家庭有着相当直接而连续的互动。这些本该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的家庭由于人贩子的非法介入,从此天人各一方,甚至永无相见可能,多数失去亲人的父母从此踏上漫长而绝望的寻亲之路,生活质量无从谈起,不少患有各类精神疾患,甚至仿佛行尸走肉。而被拐儿童除部分外,在陌生的家庭或社会福利院遭受凌虐羞辱,幼小的心灵饱受创伤。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人贩子处以极刑,遏制这种灭绝人性、破坏人伦的罪行,也是法治正义的题中之义。

近些年,正因为始终保持了极刑,加上公安部严厉打击,各地曾持续高发的拐卖恶性事件才呈现一定下降趋势。

2012年6月,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庭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蒋开枝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彭庆托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988年至2008年间,蓝树山单独或伙同他人在广西宾阳县、巴马县等12个县,钦州市、凭祥市、贵港市、河池市等地,先后将被害人韦某某、黄某某等三十多名3至10岁男童拐卖。蓝树山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获利共计50余万元。

人贩子是活在刀尖上的亡命之徒,对这些凶犯唯一正当的选择是依法严惩,而不是通过废除死刑进行变相纵容。

当然,不是所有的拐卖者都处于极刑,一切探讨的原点都应该回到现行法律框架下探讨。其实,网友激愤无比的呼吁也在表达公众一个共同心愿:依法严惩人贩子是遏制此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捍卫人伦的最现实解决方案之一。

所幸,这场争论有着一个令人欣慰的共识:加大对买方的惩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第六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而修改这一法条的呼声日益高涨。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现代法治社会,人包括身上的器官都是非卖品,这是全球共识。

拐卖背后的功利主义和人性泯灭更值得深入探讨,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对死刑的存废的争议。在拐卖儿童等恶性犯罪高发的当下,鉴于与之匹配的价值体系和现代伦理尚未构建到位,我坚持中国当保留死刑,如果非要依法限定一个范围,至少目前人贩子和贪官不能豁免,前者涉及受害家庭的情感和精神慰藉,后者涉及对当下公共利益保护的坚决捍卫。

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多达363.7万对。同时,“80后”也正在成为离婚大潮中的“主力军”。

80后:离婚潮高发为哪般?

本报记者 兰德华

近日,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粗离婚率为2.7%。这是自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2012年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结婚率增幅;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离婚率整体的不断攀升,“80后”也正在成为离婚大潮中的“主力军”。

80后,离婚成潮,是独立、自我,还是冲动、自私?是在婚姻中恋爱,还是在婚姻中“试错”?我们日渐接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说离就离的婚姻?

劳燕分飞成易事

2015年6月15日,上午9点,在河北蔚县这个塞外小城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门外,重现了当年一度在80后群体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向南”和“杨晓芸”闹离婚的情节。

80后的海鑫与结婚未满一年、同是80后的妻子陈佳佳因“感情破裂”前来离婚,可是还没进门,就起了争执、相互谩骂起来,最后两个人一度扭打在一起,引来众人围观。最后,闹剧最终以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收场。

“他们已经来这里闹过三四次了,这次终于离了。”该离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说:“最近一两年前来离婚的年轻人比例很高,多数是80后。”

本周聚焦

谁来维护“80后”楼房?

文/朝阳

本月,贵州一地出现两起“楼塌塌”事件,让人们对老旧楼房的安全问题再次关注起来。近几年,各地老旧楼房坍塌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去年,上海曾对所有的房屋质量进行排查,全城疑似危旧房屋约300多万平方米。

老旧楼房建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建筑标准低,建材质量不佳,长期养护不到位,使得一些老旧楼房存在安全隐患。而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些老旧小区往往没有业委会,也无公共维修基金,房屋产权复杂。维护保养往往既无人牵头,也无资金来源,更找不到负责单位。

建设于“房改”之前的老旧楼房,最初往往是以前房承租者提供居住,在房改之后,公租房租户如果以房改形式购买了房屋,房屋性质就变成“已购公房”,很多地方对这类房屋的相关规定是“依经济适用房管理”。房屋

“有勇敢的飞行员,也有老的飞行员,但没有又老又勇敢的飞行员。”周殿卓很早就告诉儿子,飞行经历越多,反而胆子越小。当年周大宁并不能理解父亲的话,乘客总是希望,尽快起飞,早点儿抵达。但天气不好时,机长面对乘客的愤怒,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间找一个折中点。

“尽管民航业目前在国内是法制化、规范化比较完善的行业,但需要满足越来越高的公众期待值,安全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周大宁说,“公众不会因为民航的运输量增加十倍,就能够容忍发生十倍的不安全事件或者事故。”

儿时,周大宁总是见不到父亲,因为父亲总在天上飞,而今,周大宁也在重复着父亲的经历,最忙的时候,每周他只能回家半天。他

好。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坏了就想换掉。”这句出自电影《失恋33天》里的经典台词,道破了婚姻观念的时代之变——区别于父辈在婚姻中的隐忍和妥协,80后的婚姻观则更加务实和自我。

“婚姻契约精神、婚姻家庭道德色彩的淡化以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约束的弱化,使得婚姻已不再是不变的约定和承诺。这是婚姻家庭的去神圣化或者说祛魅化。”青年学者王和说:“当婚姻变得不再神圣,那么分与合就会变得随意或者随性。而80后、90后的青年们正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世界祛魅化的过程中的两代人。”

“离婚的80后是传统教育与现代观念冲击下的矛盾体。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成长。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经历少,更看重自我感受,不愿意吃亏、不轻易付出,很少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这让80后的婚姻生活暗礁重重。坚持自我也是一柄双刃剑。”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离婚律师赵丽说出了她对80后婚姻观念的看法。

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的变化作用于80后这一群体最为明显,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婚观念较之于父辈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看来,“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中,个人并不需要通过家庭得以生存,而婚姻家庭中人们对于情感满足的需要却日益增加。但人的情感需求是多样并且不断变化

的,婚姻由此变得脆弱。

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社会的组织原则不再是家庭为本了,而是个人为本。人们没有必要为了生存而妥协,因此婚姻关系变得脆弱,传统上可以透过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情感功能来维系的关系,现代只有依靠情感功能来维系。

她进而指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情感时代”。后情感时代的特点是社会组织原则发生变化,从“集体主义”或“家庭本位”的社会组织原则向“个人主义”或“个体本位”的社会组织原则转化。

因此,较之50后、60后、80后、90后,婚姻观的上述特点更为显著。

爱情没有了一个人的事,婚姻却是两个人的事。当没有了妥协的理由,分开变得不再沉重。

法律变迁推波起

结婚是权利,离婚同样是公民的自由。但统计显示,婚姻立法的变化和调整,客观上助长了离婚率的走高。

1950年,我国首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后,1953年人民法院就接到117万件离婚案件,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离婚潮”。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到2002年,我国离婚率一直较为稳定,在1.5%~2%之间,甚至2002年呈现下降趋势为1.8%。2003年,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婚姻登记机关设置更加合理,登记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办理离婚登记。因而2004年,我国离婚率

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离婚166.5万对,离婚率上升至2.56%。此后,历年离婚人数均成上升趋势。

“《婚姻登记条例》的出台,一方面保障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冲动型、草率型的‘闪离’提供了便利。”一位婚姻登记工作人员说。

社交媒体亦助澜

此外,随着当下社交软件更新换代以及飞速发展,客观上为婚外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打破了陌生人时空壁垒,让互动成为了可能。

记者采访中发现,80后群体作为第一批网络原住民,其整体应用网络社交媒体的能力也同其婚变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记者采访的若干80后婚变当事人中,不少是因“QQ”、“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诱发出轨导致离婚的。

“在微信上和陌生人聊得多了,夫妻之间却沟通的少了。”凯丽告诉记者:“离婚前曾段时间,我和他很少聊天,在家或出门吃饭,大部分时间各自看手机。他就是用微信勾搭我朋友,结果我朋友把聊天记录截屏发给我后败露的。”

在福建从事离婚法律咨询的林涛表示:“在我接手的案例来看,80后离婚咨询中,因社交软件导致出轨的比例超过50%。”

壹婚姻网调查数据显示,通过微信、陌陌等社交媒体发生婚外情的案例近年增加了20%。

(应当事人要求,涉及离婚被访者均为化名)

编读时代

本报法人微博网友留言摘编

(2015年6月13日~2015年6月19日)

【海口书店店主发公开信求援,你支援吗?】海口全市除新华书店分店外,仅余4家传统书店。日前,海南民生书店老板孟波发一封关于民营实体书店经营状况的公开信贴到了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电子书籍冲击下,以纸为载体的传统书籍步履蹒跚。”你怎么看?

(2015年6月14日《工人日报》报道)

@一叶橘子:连实体书店都快没有了,还怎么提倡全民阅读?

@立峰观云:现在实体书店的图书类型太少,很多是早教、应试、营销类题材。进书店后,感觉无书可买。书店是否应反思?

【河南各地将统一开设“劳模街”】今后在河南,各地要在主要道路两旁建立以树立劳模形象、展示劳模风采为主题的劳模宣传一条街。一名退休职工说:“从前,劳模的知名度多高啊,说被崇拜一点都不夸张。在倡导尊重劳动、尊重劳模的今天,该找回这个风气了!”

(2015年6月15日《工人日报》报道)

@梁德志_:开设“劳模街”有助于让“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是,也要防止“劳模街”成为“面子工程”。@我爱呼噜你呢:让劳模得到实惠才是最好的宣传。

【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年近六旬的云南农民工袁家富每年春节后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有两个子女的他最终都会选择扛起行李,坐上去广州的客车。“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多攒钱和靠儿女养老仍是多数高龄农民工对养老的想法。

(2015年6月18日《工人日报》报道)

@一壶龙井天高云淡: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每年春节,我和哥哥都劝他不要再出去打工了,父亲当时是答应了,但春节后还是又踏上了外出务工的路。老人只为多挣点钱,少给儿子增加负担,父爱如山啊!

@何友林00: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谁不想早一点享晚年?可如果不干活了,未来的各项开支,又能靠谁呢?

(赵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欢迎读者到新浪、腾讯、人民网平台与工人日报微博互动



微创业

6月19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控岗岗村移民郝天志、胡敬华夫妻正在家里从淘宝网上传有机水果和有机蔬菜到北京市和广州市。

2014年5月,郝天志夫妻回老家创业。他们将目光对准了当地移民种植的有机水果和有机蔬菜上,注册领取了“郧县柳陂开心农庄”,通过淘宝网将移民种植的各类水果,以及土鸡蛋、黄瓜、西红柿、茄子、丝瓜等蔬菜卖到北京市和广州市,并有6名内安移民在郝天志夫妻的“郧县柳陂开心农庄”打工,而他们经营步上正轨,月收入也达到6万多元。

周家山 图/文

新闻图说

给流浪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陕西省宝鸡市社会救助管理站见闻

【新华社西安6月20日电(都红刚 张雯)】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救助管理站通过购买社会机构服务,对辖区内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和服刑人员子女进行危机干预、早期预防,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这种群策群力的救助模式,为流浪儿童重筑了一个温暖的家。

6月19日,是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在陕西省宝鸡市救助站二楼的一间手工制作室内,小女孩兰兰(化名)正在认真地做着手工艺品,在她身旁的桌子上摆着很多已经做好的玫瑰、百合等手工作品。“真漂亮、手真巧!”听到记者的赞叹,兰兰羞涩地说:“救助站免费为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工作场所,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今年每月投入5.2万元购买了20个工作岗位,解决了以往救助站存在的救助人员专业性不强、用人机制不够细化等问题。”

记者在救助站内看到,这里的多媒体电教室、阅览室、手工室、心里辅导室、康复训练室、餐厅等场所不仅功能齐全,走进孩子们的宿舍,床铺也是整理得干干净净,上面摆放着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儿童玩具。

兰兰患有先天性风湿病,兰兰关节不能弯曲,骨龄年龄已经60多岁,医生当年诊断她活不过18岁。但在救助站的悉心照料下,今年兰兰已经19岁了。

作为国家未成年社会保护试点站,

环节细致入微的照料下,目前,生活在援助中心的17名孩子中目前已有9名适龄和具备条件的孩子进入附件的学校上学。

据了解,为流浪儿童提供专业服务只是援助中心工作的一部分,近年来他们深入山区、社区、学校等地,针对父母死亡、服刑、智障、残疾、患有慢性疾病、长期在外打工的孩子,对他们展开早期干预和救助,从源头上预防因困境儿童外流。目前,每年固定帮扶的孩子160名左右,登记在册的跟踪服务儿童达280名以上。

前几天刚刚来到救助站的8岁女孩洋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服务人员发现的。洋洋的母亲2013年因吸毒去世,父亲也因吸毒患上了艾滋病,被发现时洋洋正和父亲的“毒友”生活在一起。

等到徒弟要参加技师考试时,师傅就拿出了激励法,说他不敢参加报名,年轻的赵新一下被“刺激”到了,他下班缠上师傅陪练。一块板一块板地练样板制作,一辆车一辆车地练全车落成。从最初的一开锯,锯条就断,到后来做出的样板,自己不用试,就能蒙着照制作,装配成功。赵新的坚持让吴云鹏感动:“技师考试前,赵新的女儿出世了,可他愣是一天都没停止过练习。”赵新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技师资格证。2014年,赵新荣获全路“青年岗位能手”的称号。

师傅吴云鹏也从徒弟身上学到了东西。“他的拼劲和沉稳其实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前吴云鹏的脾气急躁,遇事总爱和人急,都是赵新帮他打圆场。如今,他从徒弟身上学会了忍耐。

【本报讯】黑龙江省北兴农场检察院注重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安全监管工作的监督,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为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监管秩序,该室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动态分析,及时听取、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管控情况,掌握动态,督促司法管理部门认真做好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管控和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工作监督。同时,强化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警示教育,与本人及其家属、街道帮教小组成员座谈。(王景波)

北兴检察院加强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讯】近年来,浙江省龙游县联社工会始终坚持以基层一线为重点,加强员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工作。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化“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当知识型员工”活动。举办员工职业技能大赛,促进员工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提升。

他们还加强员工文化生活建设,精心筹备,广泛开展各种文化体育健身系列活动。

(李国锦 廖晨晨 吴庆霞)

觉得,自己亏欠最多的,就是7岁的儿子。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跟父亲一样,直到退休的那一天,都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能让乘客们安全抵达,和亲人团聚,就是我们飞行员永远的职业追求。”周大宁说。

师傅教给我“理解”

师傅:吴云鹏,上海铁路南京车辆段徐州北检修车间台车组的副工长,上海铁路南京车辆段工首席技师

徒弟:赵新,上海铁路南京车辆段徐州北检修车间技师

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吴云鹏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都去接赵新上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徒弟喜欢看球,让徒弟多睡会儿也是好的。吴云鹏是上海铁路南京车辆段徐

州北检修车间台车组副工长,赵新是车间的技师,也是段里足球队的主力。

刚开始,赵新做学徒,两人一起搬配件,不小心闪了师傅的腰,而师傅三天后就要参加技师资格考试。赵新原以为自己“惹事了”,结果师傅说:“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和你没关系!”后来,忍着伤痛的师傅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以出人意料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

从此,赵新既佩服师傅的功底,也佩服师傅的大度和理解。师傅从来干涉赵新看球,为了师徒间更好地交流,不爱看球的吴云鹏也试着拿起足球来:“其实足球比赛和吴云鹏比武一样都需要活力和不怕输的劲头。”吴云鹏总结说,他总用这点激励徒弟,引导徒弟在足球场上的拼劲用到练功场上来。